

国际关系理论前沿译丛

局部全球化世界中的自由主义、 权力与治理

**Liberalism , Power and Governance
in a Partially Globalized World**

罗伯特·~~韵~~基欧汉 著
罗伯特·~~韵~~基欧汉 门洪华 编
门洪华 译

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局部全球化世界中的自由主义、权力与治理 (美)基欧汉著 ;门洪华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国际关系理论前沿译丛)

陈序经

I 揭... II 揭...②门... III 揭国际政治 原文集 IV 揭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000000 号

书 名 :局部全球化世界中的自由主义、权力与治理

著作责任者 :〔美〕罗·基欧汉著 罗·基欧汉 门洪华编 门洪华译

责 任 编 辑 :金娟萍

标 准 书 号 :陈序经

出 版 发 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 北京大学校内 陈序经

网 址 :陈序经 电子邮箱 :陈序经

电 话 :邮购部 陈序经 发行部 陈序经 编辑部 陈序经

排 版 者 :兴盛达打字服务社 陈序经

印 刷 者 :

陈序经 伊陈序经 粤陈序经 张陈序经

陈序经 缘第 员版 陈序经 缘第 员次印刷

印 数 :陈序经—陈序经

定 价 :陈序经元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教材供应部门联系。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美国著名学者罗伯特·基欧汉教授过去 15 年撰写的主要论文的结集，是专为中国读者编辑的一本学术著作。收录了基欧汉教授 1989 年至 2004 年撰写并公开发表的 15 篇论文，以及 2004 年专门为本文集撰写的两篇文章，其中《多边合作的俱乐部模式与民主合法性问题》一文是由基欧汉教授与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院长约瑟夫·奈教授合写的。这些文章都是围绕世界政治的相互依赖、制度、全球化、治理等问题展开的，每篇文章都揭示了世界政治的一个层面，它们共同构成了理解世界政治的多个角度。本书的主题是，探究在相互依赖的情境之下国际制度如何运作。作者期望并相信，自己的学术研究能够引起中国学者的深入思考，对中国认识处于变化中的世界政治有所启迪。本书还附有门洪华博士的一篇论文，作为中国学者对国际制度理论及其应用的思考、对基欧汉学术研究的回应。

编者简介

导言

现实主义、制度理论与全球治理^①

【内容提要】 本文为全书的导言 ,全面介绍了作者几十年从事世界政治研究的历程和本文集诸论文的主要内容。本文以相互依赖为分析起点 ,探讨“制度理论”及其研究纲领 ,并分析它对国际法研究的意义 ;分析当代两个关键性的“时髦用词”全球化与治理 ,并尝试运用在研究制度和相互依赖时所确立的分析框架。作者指出 ,这些文章都是围绕世界政治的相互依赖、制度和治理等问题展开的 ,每篇文章都揭示了世界政治的一个层面 ,它们共同构成了理解世界政治的多个角度。本导言专门为中国读者而写 ,作者强调指出 ,关于世界政治的理论著述不可能存在于真空之中 ,而是产生于理论家所面对的形势和困境之中。作者指出 ,本书的主题是 ,对国家政策而言 ,国际制度非常重要。制度不能替代国家政策 ,如果期望国家战略有效 ,则必须将国际制度考虑其中。制度提供行动途径 ,建立标准 ,塑造他者对恰当行为的认知 ,影响对其他国家如何行动的预期。

本文集包含我过去二十年撰写的主要论文。它们都是围绕世界政治的相互依赖、制度和治理等问题展开的。这些论文探讨的问题各不相同 ,但我相信 ,它们都是从一致性的分析框架展开的 ,即这些论文探讨了关于世界如何运转的观点 ,每篇论文都揭示了世界政治的一个层面 ,它们共同构成了理解世界政治的多个角度。

① 本文为作者集“国际政治理论”第二卷,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詹姆斯·曼宁(James Mann)编辑。本文完成于 2005 年 12 月 1 日,其主要内容引自:詹姆斯·曼宁(James Mann)著,《国际政治理论》,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6 年。

本导言的目的在于 ,首先说明世界如何运转的观念。鉴于制度既为人类行为所造就又建构人类行为 ,这既是个体主义的又是制度主义的。从这方面讲 ,人类行为的主要动机是自利的 ,理性引导该行为 ,并将结构和制度条件转化为收益、可能性乃至动机。但是 ,我关于自利和理性的概念是比较宽泛的。自利并非仅仅是物质性的 ;相反 ,它包含被视为或自视为思考缜密的兴趣。一个人的自我利益不能与其主导信念或认同(~~差别~~)区分开来 ,二者之间密切相连。进一步说 ,并非所有的行为都必然属于自利行为 ,例如 ,~~1993~~ 1993年 9月 11日消防人员冲进世界贸易中心的火海印证了他们的承诺和勇气 ,而他们的所作所为与利益无涉。

最终形成的关于世界如何运转的观念非常复杂 ,应将客观性与主观性、实力的最初推动与制度约束、主要信念和难以确认的世界观乃至理性算计一并考虑在内。因此 ,它缺乏简洁性。我对这一世界观点的核心贡献在于 ,探究在相互依赖的情境中国际制度如何运作。在对制度与相互依赖进行探索的过程中 ,我却意识到它们可能受到其他更宽泛因素的影响。因此 ,我并未假定制度与相互依赖是当代世界政治最为重要的方面 ,或它们是解开历史之谜的独特钥匙。实际上 ,只有当它们适宜于分析更大的谜团之时 ,它们才变得有意义。

本导言是专门为在中国出版的著作撰写的 ,非常期望本人关于世界的这一观点能够对中国读者有所启迪。显然 ,我的观点是倾向于美国的。关于世界政治的理论著述不可能存在于真空之中 ,而是产生于理论家所面对的形势和困境之中。世界政治的变化、特别是美国角色的变化每每激发我的思考。美国面对的诸多事务看起来与中国不同则是不可避免的。当然 ,本书的主题是 ,对国家政策而言 ,国际制度非常重要。制度不能替代国家政策 ,一般而言 ,与强大国家强制实施的规则和决议相比 ,制度规则和决议的实施确实太过虚弱了。但是 ,如果期望国家战略有效 ,则必须将国际制度考虑其中。制度提供行动途径 ,建立标准 ,塑造他者对恰当行为的认知 ,影响对其他国家如何行动的预期。即使强国试图挑战或忽略国际制度 ,它们将会遭遇拒绝以及相当强烈的抵制。中美两国都是足够强大的国家 ,会不时挑战国际制度 ,但它们都未强大到足以避免这种挑战后果的影响。

本文的分析起点是相互依赖的概念 ,如约瑟夫·奈和我在 ~~1993~~ 1993年探讨和阐述的。其次 ,我将探讨本人所称的“制度理论”及其研究

纲领(《国际组织》,1975年),并转向分析它对国际法研究的意义。自此,我开始分析当代的两个关键性的“时髦用词”(时髦用词——全球化与治理,并试图表明,在探讨这些概念的过程中,我如何运用和阐述在研究制度和相互依赖时所确立的分析框架。在本导言的最后部分,我提到了一篇我对世界政治的理解如何可用于分析当前事件的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是《非正式暴力的全球化》,是对1991年1月17日美国遭受恐怖袭击的案例分析,它对我们试图理解这个迅速变化世界的世界政治学者提出了挑战。

从相互依赖到制度理论

三十多年前,世界政治经济的敏锐观察者就开始评论各社会之间经济联系的巨大增长以及多国公司作用的增大(《世界经济》,1975年)。同时,欧洲共同体的研究文献——厄恩斯特·哈斯(《欧洲共同体》,1975年)为开创者——聚焦于经济相互依赖如何影响治理安排(《欧洲共同体》,1975年)。我与约瑟夫·奈以这些主题为导向,开始编辑关于跨国关系的《国际组织》专辑(《国际组织》,1975年)。“跨国关系”(跨国关系)并非我们杜撰的术语,但确实是我们将之纳入世界政治的文献中。

在那个时代,反映这些变化的时髦用语是“相互依赖”。20世纪70年代,我与奈建立了一个阐明“复合相互依赖”概念的理论,在分析多个跨国问题及跨国联系的理想模式中,武力不再是政策的有效工具。我们对相互依赖的界定更为宽泛,将包含武力和经济的战略问题都纳入其中。在我们的分析中,相互依赖常常是非对称的、高度政治性的:确实,相互依赖的非对称性造就了各国以及非国家行为体的权力资源。1977年第一次出版的《权力与相互依赖》详细阐述了这一理论,并用以分析五十年历史(1920—1970年)的两个问题领域(海洋和货币)、两个双边关系(美澳关系和美加关系)。我们的分析存在诸多漏洞,在十年之后我们承认某些缺陷的存在^①,但是我们

① 参见:《国际组织》,1975年,该文重印于《权力与相互依赖》的第二版和第三版(分别于1977年和1985年出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三版)已经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是“国际关系理论前沿译丛”的第一本译著。——译注

对非对称相互依赖与权力之间关系的分析仍然是有用的,该书《跋》对此进行了论述。

《权力与相互依赖》包含着关于国际制度的初始理论,我和奈称之为机制变迁的国际组织模式(奈和基欧汉最早提出这一概念)。但是,这一理论并没有得到进一步完善。《权力与相互依赖》出版后的七年间,我专注于研究国家为什么建立国际机制——限制其成员行动之法律自由的、规则导向的制度——的难题。在1994年出版的《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中,我提出了基于理性主义理论、特别是公司和不完善市场之经济理论的国际制度理论。我认为,制度执行着国家的重要任务,使得它们可以合作。特别是,制度降低了制定、监督和实施规则的成本(即交易成本),提供信息,促使各成员国做出可信的承诺。按照该理论,确保各成员国遵循其承诺的主要是互惠(既包括报复威胁也包括互惠合作的承诺)和声誉。关于该理论主要观点的简要总结及其演变的探讨,可参见本书第七章。

我提出的制度理论常常被称为“自由制度主义”(造词者误译自liberalism)或“新自由制度主义”(造词者误译自neoliberalism)。这些标签并不适合我,当然,这不仅仅是它们令人困惑的缘故。我的理论确实源于自由主义,本书第三章和第十一章表明了这一点。但是,自由主义的内涵是多重的,而且容易误导。我的理论与如下观点没有任何关联:商业必然导致和平,人性本善,人类历史的进步是必然的,尽管这些命题有时与自由主义联系在一起。同样,我的理论与自由优先于平等和社会正义的观点也无关涉,与上一个1990年流行的“新自由主义”关联甚少:所谓的“华盛顿共识”(1996年提出)要求解除发展中国家政府对市场的诸多管制。我的自由主义观点对人性的看法更为悲观;与某些古典自由主义流派相比,我对从经济到政治的因果联系持更为谨慎的态度;而且,我从来不是带有强烈新自由主义色彩的“华盛顿共识”的支持者。既然贴上“自由主义标签”需要对我的观点做出如此多的说明,似乎完全不用该标签更好。

“制度主义者”(造词者误译自institutionalist)是对本人著述恰当的总结性用词,因为它强调了制度的重要性,并试图对制度进行解释。使用该术语并不意味着我自己宣称拥有知识霸权。确实,许多其他的制度理论也是存在的,并且与我的理论在概念、含义等方面常常差别甚大

(西)制藥業界音的道藥上員總,精製藥團; (西)制藥業界音的道藥上員總,研製藥員總,研製藥員總)。然而,我认为,与其他学者一样,本人的理论模式完全担得起“制度主义”这个形容词。下文所使用的“制度主义理论”指的是我自己版本的制度主义。

《霸权之后》的理论是相当程式化的。如同《权力与相互依赖》,为简洁之便,作者故意忽略了国内政治的不同。但这并不是说要否定国内政治的重要性,恰恰相反。但是,该理论并没有包含国内政治的论述。实际上,国内政治理论的省略导致了足够宽泛的理论缝隙,促使诸多学位论文专门论述该问题。我的许多学生代表该努力方向的佼佼者。他们对国家间政治和国际制度、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进行复杂的分析,以此研究国内政治对世界政治的影响。^①事实上,我的学生们已经撰写了十多部论述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的著作,这不仅仅为了取悦于本人,而是表明了美国研究生教育往往为人所忽视的一个重大方面。学者们的简历通常只包括自己的著述。但是,对他们的学生、他们的整个研究领域以及他们自己的贡献而言,他们认识到但未能解决的难题同等重要。通向敞开大门的途径呼唤抱负远大的学者而不是富丽堂皇的学术大厦,不管后者多么令人神往。对研究生的研究和激励指导着他们的教授们。研究生教育是一个交流的过程,而不仅仅是知识传输。

我对贸易、货币和能源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为了物质上的自利、互惠在其中扮演实质性角色——的研究对《霸权之后》提出的理论以及与此密切相连的其他著述(参见 迈克尔·曼 1997)影响甚大。总体而言,该框架也非常适用于分析环境问题(戈登· 迈克尔·曼 1998)。或许,这种适用性并不令人惊奇,因为类似的问题都源自跨国界外部性和经济竞争。在这两类问题上,监督协议的执行都是重要的,而监督主要是由国际制度来主导和执行的,国家可以采取强制行动,但要经过这些制度获得合法性。

环境问题确实具有道义的层面,而这是《霸权之后》所强调的经

① 在这方面做出贡献的学生太多，我恐怕难以列出详细的名单，因为我担心漏掉某些为我个人所尊重的关键著述。我的学生们探讨了国内政治与世界政治的联系，他们的著作包括：闵寿基曹真南元，员善哲朴光范，运钟英光范，西孝镇崔世南元，西永植曹景元恩，西志镇朴成恩，蔡世光范，韵哲朴光范，李吉昌朴光源，李秉真光源，朴熙默曹光范，再美曹光范，姜世在曹真南元光范爱。

济问题所缺乏的。在促使公众关心臭氧层枯竭、海洋污染和全球气候变暖等问题上,与善恶相关的原则性观念扮演着重要角色。在人权问题上,这些原则性观念扮演着更为突出的角色。在关于两个问题领域以及其他世界政治领域的政策辩论方面,详细说明因果关系的因果观念(精确性观念)起着重要作用。

朱迪斯·戈德斯坦(先于她,戈德斯坦)和我对观念的作用、观念与理性主义分析框架的联系发生了兴趣,并于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开始研究观念对政策的作用(即观念对政策的作用)。当然,长久以来,探究观念的作用一直是国际关系领域诸多著名学者——包括我的导师斯坦利·霍夫曼(先于她,霍夫曼)、海德利·布尔(先于她,布尔)和马丁·怀特(先于她,怀特)等——著述的主题。而我与戈德斯坦特别感兴趣的是,如何将理性选择理论、我们所赞成的理论以及我们对观念在世界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观点融合成为一体。我们区分了三种类型的信仰:世界观,原则性信仰和因果性信仰。我们以宗教为例说明世界观,以人权学说为例说明原则性信仰,以凯恩斯或其他宏观经济学的货币理论为例说明因果性信仰。这三种形式的信仰都影响政策,但其区别甚大。

随后,我与戈德斯坦指出,观念通过三种因果性途径发挥影响:其一,作为路标;其二,作为没有独特平衡的焦点;其三,作为制度的内嵌因素。我不想在此重复该论文的内容,因为它早已为人所熟知,容易看到、读到,而且它是本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是,我非常重视观念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我个人的思考深受此影响,并因这一研究项目得以更加深入。如下文所表明的,最近我对国际法的著述试图探究融入法律思想的观念如何影响世界政治中的说服及其实践。

最近频频提及的批评是,建立在个体主义本体论和新实证主义认识论基础之上的、对世界的看法必然降低观念的作用。以上评论表明,我对此持不同意见。确实是个人持有信仰,当然这些信仰是经过社会进程而形成的,它们通过超越个人生命的社会化而永恒。作为社会科学家,我们可以通过理论和经验研究分析这些信仰的影响,探究个人与群体之间的信念变迁,以此解释行为的变化。当然,我们必须警惕社会规范及其实践、共有记忆的运作——因此我们不能接受未经社会化的人类原始概念。正如亚里斯士德(先于她,亚里斯士德)指出的,

人是社会性动物。但在我看来,我们应该聚焦于个人,将个人作为主要的分析单位,同时谨记个人在社会中的互动以及他们生活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这意味着,分析者应往来于个人与社会之间,同时重视二者,但往往寻求解释个人行为并逐步累加,在尚未确定最终命题是否与个人行为模式一致之前,并不寻求对社会提出理论化解释。如此,则我们可以为我们的理论提供微观基础,避免抽象概念的具体化或提出似乎缺乏科学论据的集体意识。

关于观念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最重要的著述不是我的,而是其他学者的贡献。制度主义理论的逻辑建立在互惠基础之上,因而未能很好地解释人权政治:各国不会降低自己的人权,来报复其他国家对人权的侵犯(勾魂夺魄面市)。就其他问题而言,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运用,原则性观念和组织文化似乎在解释行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运朝英译著,若友怨怨,蕴朝景怨怨)。与早期侧重心理学的著作一样(演警怨怨),“建构主义”关于世界政治的论述强调主观的重要性:在塑造世界政治的过程中,我们对世界图景的信仰建构起来(宰溪勘景怨怨)。关于观念作用的著述主要是如下学者完成的:戈德斯坦、玛莎·费丽莫(配朝译,云社景怨怨)、玛格丽特·凯克(配朝译,戴运朝)、弗里德里克·克劳托奇维尔(云朝译,戴运朝)、亨利·诺(勾魂夺魄面市)以及我的学生丹尼尔·菲利普特(阔林哲,马塔戴,托马斯·瑞斯(裁景,克,音,约翰·杰拉尔德·鲁杰(先景,社景,胜,厄早,景和凯瑟琳·辛金克(运朝,社,景,景)。①

制度理论与现实主义理论

我们需要从探讨中明白的是,我并未宣称制度理论是关于世界政治的一种全面理论(葬朝,景,另景,景,通朝,办,朝)。但我仍然相信,它高于未能将国际制度作为重要实体的初始现实主义(配朝,景,圣,澳,员,怨,怨,怨,运朝,景,景,景,世,云朝,景,景,怨,怨)。正如彼得·卡曾斯坦、斯蒂芬·克拉斯纳和我指出的(勾魂,心,运朝,景,通,景,运朝,景,景,景,苗,怨,景,社,运朝,景,景,怨,怨),关于现实主义和制度主义的程式化竞争并不特别有益于当前

① 尤请参见:别道,景,景,怨,怨,云社,景,景,怨,怨,运朝,景,景,景,景,怨,怨,运朝,景,景,怨,怨,景,怨,怨,怨,孕,景,景,景,面,市,厄,景,景,厄,景,景,景,怨,怨,厄,景,景,怨,怨,怨

解障碍的范式”。^①

自由主义、互惠与国际机制的需求

思考制度与相互依赖的方式之一是 ,将相互依赖视为国际制度运作的情境。按照该观点 ,制度是对相互依赖做出的一个反应。在现代思想传统中 ,最有益于该问题框架的就是自由主义 ,我在第三章中对此进行了历史分析。作为分析国际关系的一种方法 ,自由主义强调个人 ,试图理解集体决定 ,从伦理角度促进人权 ,试图改善人类环境。复杂的自由主义同时包含着重商主义、共和主义和调节政治 (则与自由主义相矛盾)。在多元民主的情境之下 ,为应对经济相互依赖而试图调节跨国关系。自由主义重申制度主义者的努力 ,即为设计促进合作、福利和人权的制度之故寻求对政治的理解。

如前所述 ,自由主义有多种表现方式 ,它们之间并不完全一致。因此 ,总体而言 ,自由主义并未提供具体的规范性指导方针。我在第十一章更为具体地论述了我自己的自由主义主张。它强调 ,人类的相互依赖产生了纷争 ,导致了对制度的需求。但它也强调制度可以是压制性的。我的自由主义观难以对《加底德的伏尔泰》(灾难漫画式)的主张过分乐观 :因为其主人公从一个灾难走向另一个灾难 ,仍然宣称他自己“处于可能世界的最佳点上”。我的自由主义观认可朱迪斯·辛克莱关于“恐惧的自由主义”的观点 ,但同时仍然对进步充满期望。从知识角度讲 ,我所尊崇的知识英豪包括 :詹姆斯·麦迪逊 (先贤祠有留像) ,他认可必须设计制度以彼此检验 ;约翰·罗尔斯 (先贤祠有留像) ,他建立了基于公正的道义理论。我相信制度包括国际制度应对其被管理者负责。我们期望制度尽可能建立在诚实说服而非强制或基于资源不对称的讨价还价的基础之上 ,它们鼓励公共参与。我自己的自由主义观主张坚决反对乌托邦主义 ,但对公共政策提供了规范的、积极的指导。

^① 我负责编辑的《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一书被广泛应用 ,而且仍在印刷出版。我对此可谓忧喜交集。它将肯尼思·华尔兹关于新现实主义思想的核心论述以及早期对这些著作的主要批评纳入其中 ,这是有益的。但是 ,该书可能促成了此后十年“我们对他们”的探讨论调。

依自由主义的观点,人们或群体自己作出决定,而不是受限于传统主义和刚性的等级制度。然而,为实现自己的目标,他们必须与其他人或群体合作。在这样的社会——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中,互惠发挥着重要作用:人们期望完全是以其人之道对待其人。本书第四章提出了国际关系的互惠概念,区分了“特定互惠”(泽林斯基)和“扩散性互惠”(范德林德)。特定互惠包括直接的奖励和惩罚;而扩散性互惠指的是人们对他者做出行为而不企求得到同样的反应,而是期望自己的行为有助于塑造整个社会的行为。

本书第五章探讨国际机制的“需求”,采用宏观经济理论探究各国为什么时常寻求建立国际制度,即使这些制度约束了它们自己。我提供的答案——其主旨在于制度提供信息、降低制定和实施互惠协议的成本——是我在《霸权之后》进一步完善的理论核心。对我而言,这一答案有助于解释世界贸易组织以及中国加入该组织的决定。

本书第二部分侧重于制度和制度变迁问题。第六章比较了20世纪80年代早期我个人提出的研究范式以及他人提出的我称之为“反思主义”(詹姆斯)的范式,后者现在被称为“建构主义”。建构主义尤以20世纪90年代亚历山大·温特(约翰)等学者的著述为代表。这些学者研究主观性和观念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发展出包含经验主义分析和理论的“一种明确的研究纲领”。我对他们提出了挑战。

此后,许多学者发展出这样的研究纲领,尤以彼得·卡曾斯坦及其同事关于国家安全的著述为代表(约翰)。本书第七章简要总结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制度主义文献的某些洞见。

主权在自由主义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因为它阐明了当代自由主义的核心压力。商业自由主义强调劳动分工的获益,因此支持更加开放和确保开放的制度。相反,共和自由主义强调明确界限内的自决和民主,民众可因此对自私的行为个体施展有效的控制。从商业自由主义的立场讲,主权是一个问题;而从共和自由主义的立场来看,主权则是实质性的保障。因此,并不令人惊奇的是,当代关于开放的争论往往导致主权的支持者与反对者的分庭抗礼,传统右派与传统左派意见殊异。

主权在国际制度的研究中也占据重要地位,因为这些制度既表达了主权同时又限制了主权特权。联合国或世界贸易组织会员国的

身份是主权的反映,但同时也限制了其成员国的行动自由。本书第八章关于主权与制度变迁的文章写于 1980—1981 年,发表于 1982 年。该文章凸现了我所称的“霍布斯之困境”(1982 年),即国内层次上集中权力创造秩序可能导致掠夺性的、压迫国家,从而危及世界秩序。在我看来,历史性的自由主义解决方案——建立在对自我利益的理解而非理想主义基础之上的制度——不仅与国内宪政主义相关,而且与国际机制的创立密不可分。洛克(1632—1704)和麦迪逊是本文所尊崇的知识豪杰。主权是为国际社会创制的一种制度,与其他制度一样,它顺应环境条件而发生变迁。经合组织区域具有我与奈所称的“复合相互依赖”特征(1980 年),其中主权正在从一种领土限定的屏障向一种讨价还价的资源转变。

当西方在前南斯拉夫的行动处于最微弱、最犹豫不决的境地时,我清楚地——或许太清楚了——区分了复合相互依赖和“冲突区域”的情境。鉴于本人并未预见到恐怖主义威胁,我企盼在苏联崩溃之后,美国可能“不愿意在这些区域进行干预,除非其代价低廉”。即使在“9·11”之前,北约在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的武装干预已经宣告了该预言的无效并表明,在世界的冲突区域,主权并不像我预测的那样成为行动的障碍。

从制度到法律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几个颇具创新精神的法学学者开始应用制度主义理论。肯尼思·阿博特(1943—)在一篇重要的法律评述文章中系统回顾和评述了制度主义理论。安玛丽·斯朗特(1940)以其早期姓氏伯利(1940)发表文章指出,政治学者用法律散文的方式说话,但自己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们进行理论化的制度都是数代法学家曾经描述过的,尽管他们未曾就此加以解释。^①几乎与关贸总协定(1947)从一个没有约束力的体系转变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体系(即 1995 年演变为世界贸易组织)同步。在观念世界和国际制度的真实世界,制度与法律的区分越来越细微了。

我个人对国际法的厌恶形成于研究生时期,刘易斯·索恩和格林

① 又参见:奈(1990)和奈(1991)。

